

冯邦彦 著



香港华资财团

1841-1997

东方出版中心

香港华资财团

1841—1997

冯邦彦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冯邦彦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8.7

ISBN 978-7-80186-856-5

I. 香… II. 冯… III. 经济发展—香港—1841~1997
IV. F127.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4393号

本书原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现经由原出版公司授权东方出版中心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

登记号:09-2008-361

香港华资财团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昆山亭林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710×1020毫米 1/16

字数:440千

印张:29.25

插页:2

印数:0,001—4,085

版次:200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186-856-5

定价:45.00元

前言

香港华资和香港英资,长期以来均是香港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两大资本势力,彼此之间密切相关而又激烈角力,交织成一部近现代香港经济的发展史。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是《香港英资财团(1841—1996)》的姐妹篇。

对“香港华资”这一范畴,历来存在颇为分歧的认识。在本书,笔者将其定义为:由华人控制及管理的、以香港为基地或经营重心的私人资本。具体而言,包括三层规范:

首先,香港华资是指由华人控制及管理的资本,以区别于英资、美资、日资及其他国际资本。至于华人的定义,则是指中国人,不论其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持有何种国籍护照,来自何处。从历史上看,香港华资基本上是由来自中国内地、东南亚及美、澳等海外地区的华人资本,以及香港本地的华人资本融合而成长起来的。这里,华资的概念首先具有民族性。

其次,香港华资是指以香港为基地或经营重心的华人资本,具有明确的地域性。一般而言,这些资本应以香港为集团总部所在地,其主要资产、业务和盈利来源集中在香港,以区别于以东南亚诸国等海外地区为基地而进军香港的侨资。当然,这些侨资一旦将其经营重心转移到香港,就逐步融入香港华资之中。因此,香港华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再次,香港华资还有一个特定的规范,它是华人资本中的私人资本,以区别于以国家资本为后盾的中资。内地一些政府部门、国家企业以私人名义在香港的投资,其性质仍为非私人资本,故不属香港华资的范畴。

本书就是以这一特定内涵为前提研究香港华资财团的,并试图从历史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对香港华资财团的萌芽、形成、崛起以至称雄的

整个历史进程作一客观、平实的概述和剖析。全书共分七章：第一、二章“行商和买办的崛起”和“家族财团崭露头角”，概述了香港开埠首一百年间华资财团的萌芽、形成、发展及其历史背景。第三、四章“新兴财阀势力抬头”和“崛起中的挫败”，叙述了随着香港的工业化和经济起飞，新兴华资财阀在工业、航运、地产及其他各行业相继崛起，整体势力在香港经济中迅速提升，以及局部的挫败对华资财团长远发展的影响。第五章“称雄香江”，重点描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后期新兴华资财阀打破英资的长期垄断、称雄香港的历程，剖析了这种急遽转变背后所深藏的政治、经济等种种客观及主观原因。第六章“过渡时期投资策略”，考察了进入过渡时期以后香港华资大财团的主要投资策略及其转变，这种转变的时代背景及其对香港经济的影响。第七章“历史的回顾与前瞻”，是全书的总结，主要分析了华资及华资财团在香港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华资财团的经营特点及其面临的挑战，以及“九七”回归所带来的历史契机。

本书写作期间，香港的“九七”回归已日渐迫近，“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正逐步付诸实践，以董建华先生为首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政府班子已大体组成，平稳过渡已成定局，经济稳定发展，香港正在全球注目之中迈进一个历史新纪元。“九七”后，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将发生质的变化，从中英两国之间的外部关系转变为一个国家内部两种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特殊关系，横亘在两地间的主要政治障碍将随之消除，香港与内地之间多层次、多领域的经济合作更显广阔，香港作为国际资本进军内地的桥梁和跳板的战略地位亦大大提高。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无疑将为香港的华资财团带来空前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因此，现在正是恰当时机对香港华资财团的历史作一个总结和简明的前瞻，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逾一个半世纪以来香港经济所经历的深刻变化，各种资本与财团势力的激烈竞争和角力，并借此透视香港华资财团在历史新时期的发展路向。倘若本书能对读者有所裨益，笔者将深感欣慰。

本书的出版，笔者首先要深深感谢为本书内容进行订正或提供资料图片的各公司创办人、其后人及资深员工，他们的戮力相助、一丝不苟的

精神,使本书增添了更大的历史价值,以不负创业者走过的艰辛。现列诸位芳名如下(按该公司在书中出现先后为序):李宝椿置业执行董事李兆增先生,周年公子周湛樵先生,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先生,冯秉芬企业主席冯秉芬爵士,许爱周先生家族成员许晋奎、许晋干、许晋义先生,王统元先生千金王培蓓小姐,利丰集团董事长冯国经博士,梁球璐先生千金梁洁华小姐,大昌贸易行资深员工梁智斌先生,余仁生副主席余经尧先生,白花油国际执行董事颜福伟先生,前南海纺织主席唐骥千先生,南丰纺织主席陈廷骅先生,南联实业名誉董事长安子介先生,南联实业常务董事唐翔千先生,开达实业董事长丁午寿先生,丽新集团主席林百欣先生,前东方海国际主席兼行政总裁董建华先生,华光航业董事总经理赵世光先生,万邦集团董事长曹文锦先生,霍英东集团主席霍英东先生,廖创兴银行董事长廖烈文先生,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先生,合和实业主席胡应湘先生,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先生,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先生,信德集团行政主席何鸿燊先生,柏宁酒店集团主席陈泽富先生,鹰君集团主席罗鹰石先生,华人置业主席刘銮雄先生,嘉里集团董事长郭鹤年先生,卜蜂国际副总裁陈定国博士及力宝集团主席李文正先生。

同时,南北行公所、东华医院、香港中华总商会、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东亚银行、恒生银行、中建集团、利丰集团、广生堂、白花油国际、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信德集团、富丽华酒店、新鸿基地产、华人置业、国浩集团及力宝集团之公关部或有关负责人,亦协助核实资料及提供图片,他们的专业精神,使人印象深刻。

此外,为本书提供图片的尚有冼玉仪博士、李培德博士、郑宝鸿先生、巫羽阶先生、香港大学香港历史研究室、《资本》杂志、《大公报》资料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市政局、新华出版社、约翰·温纳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Graham Brash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明报出版社及名流出版社。

最后,笔者深切感谢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赵斌先生及本书责任编辑,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热诚帮助和辛勤努力,本书实难以顺利完成,并在此重要的历史时刻出版。此外,笔者还要特别感谢香港经济学社主

席胡国亨先生及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培德博士,再度为拙作撰写推介,对其厚义隆情,笔者铭感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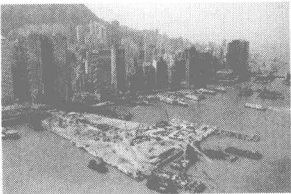

由于笔者水平所限,其中定有不少疵误和错漏之处,恳请识者批评、指正。

冯邦彦谨识

1997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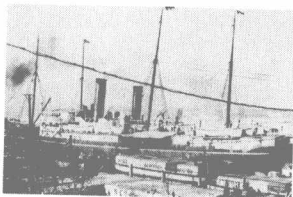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前言	1
第一章 行商和买办的崛起	1
	
一、香港开埠和早期华商的发展	1
二、行商：南北行和金山庄	11
三、依附英资的华人买办	22
四、华商在香港政坛的冒起	28
第二章 家族财团崭露头角	36
	
一、华资家族财团形成的背景	36
二、百货宗师：先施、永安	41
三、四十年代华资百货公司在内地的发展	56
四、银行翘楚：东亚、恒生	57
五、从贸易、航运到地产投资	71
六、华资大商行：利丰、大昌	82
七、华资在化妆、医药业的发展	95
第三章 新兴财阀势力抬头	109
	
一、制造业：群雄并起	109
二、蜚声国际的航运四巨子	131
三、名震香江的“地产五虎将”	144
四、从影视娱乐及酒店业崛起的大亨	168
五、新兴华资财阀势力抬头	185

第四章 崛起中的挫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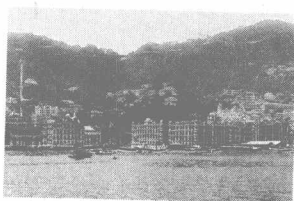
192



- 一、银行业：家族银行的噩梦 192
- 二、地产业：大衰退中的溃败 203
- 三、航运业：大萧条中的债务重组 212
- 四、挫败对华资发展进程的影响 219

第五章 称雄香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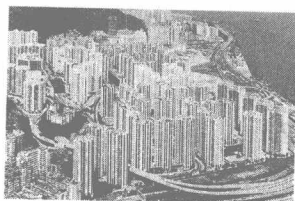
225



- 一、长实：香港首席家族财阀 225
- 二、会德丰：船王的陆上商业王国 239
- 三、地产业巨擘：新地、恒地、新世界、恒隆 250
- 四、新一代财阀：“股坛狙击手” 275
- 五、称雄香江的“过江龙” 292
- 六、新兴华资财阀崛起的原因 310

第六章 过渡时期投资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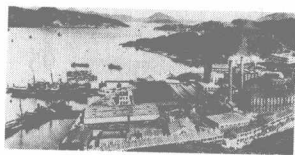
318



- 一、“立足香港,在这里发展” 318
- 二、多元化：以电讯和基建为重点 335
- 三、国际化：向海外拓展 353
- 四、挥师北上进军内地 364
- 五、投资策略转变的背景和影响 380

第七章 历史的回顾与前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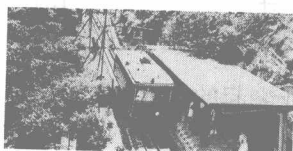
387



- 一、华资在香港经济中的地位 387
- 二、华资家族财团的经营特点和挑战 405
- 三、“九七”回归的历史契机 417

附录

431



- 一、香港华资财团大事记(1840年6月~1997年1月) 431
- 二、1996年香港华人家族财富排名榜 449
- 三、1996年国际华商500——香港公司排名录 453

第一章 行商和买办的崛起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
导致了英国对香港的侵占和近代香港开埠。

随着英资洋行、银行、轮船公司的涌入，
香港传统的自然经济日趋瓦解，西方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商业社会迅速形成。
到十九世纪末，香港从昔日的渔农社会演变成远东转口贸易的商埠，
这种急速的经济转变，为香港近现代华商势力的崛起，
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

香港早期的华商，其主力是以南北行、
金山庄为代表的行商和依附英资洋行、银行、大公司的华人买办。
这两股势力的崛起，形成了香港华资的第一次发展浪潮，
使华商成为香港经济中一股具影响力的重要经济力量，
并为香港最终确立其作为远东贸易转口港的地位，奠下了一块基石。

不过，这一时期，香港华商就整体而言，
基本上仍是作为英资财团的附属力量而存在、发展，或是在其夹缝中萌芽、
成长，尚未具备独立性。这是香港华资家族财团的萌芽时期。

一、香港开埠和早期华商的发展

香港早期华商势力的冒起，基本上是和香港开埠、逐步演变为远东转口
贸易商埠的整个历程同步展开，并互为动力的。

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

1840年6月，英国政府凭借当时如日中天的国势，悍然向日渐腐败无
能的中国清朝发动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之一是英国侵占香港及近代香港
开埠。

十九世纪上半叶,东印度公司及以怡和、宝顺、旗昌等为首的英、美洋行对中国进行的日益猖獗、规模浩大的鸦片贸易和鸦片走私,引发了中国严重的社会危机,大量白银的外流导致银贵钱贱。这种局面不但严重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生计,而且还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在全国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清政府终于下决心严禁鸦片。1838年底,道光皇帝派遣力主严禁的“抵抗派”领袖、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翌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主持销烟,制止了鸦片贸易持续惊人增长的势头。然而,以怡和、宝顺洋行为首的英商,不甘就此放弃其所攫取的鸦片贸易的庞大利益,遂积极鼓动英国发动侵略战争。

1840年6月,英国政府派遣海军少将懿律(G. Elliot)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 Elliot)为正副全权代表,率领一支由48艘船舰组成,包括16艘军舰和4000陆海士兵的东方远征军前往中国作战。懿律率军封锁广东珠江口后,即挥师北犯,直达海河口,威胁京津重镇。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清政府大为恐慌,遂将林则徐革职,改派“投降派”、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与英军交涉。

1841年1月20日,义律发布了一项“给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声称已与琦善签订“穿鼻条约”,将香港岛割让予英国并赔款600万元。唯此条约未经清政府同意,琦善上奏时不过恳准“其就粤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并无割让香港之意。英国政府对这项“草约”亦极为不满,认为义律从中国攫取的利益太少,决定推翻,解除义律在华一切职务,改派侵略印度有功的砵甸乍(又称璞鼎查,H. Pottinger)为侵华全权代表。

砵甸乍到中国后,即率英军舰队大举进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攻陷厦门、定海、宁波、上海,并沿长江进攻,直达南京江面。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强大军事压力下,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赔款2100万两白银;开放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和广州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条款,是割让香港岛予英国,规定中国“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王位者,常远据守主管,任便立法治理”。

不过,英国政府并不满足于只占领香港岛。1856年10月,英国借口所谓

“亚罗号”事件^[1]，组成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10月24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将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划分势力范围狂潮，1898年6月9日，英国政府再迫令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及附近200多个岛屿，即后来被称为“新界”(New Territories)的地区，租借期为99年，到1997年6月30日届满。

就这样，在从事鸦片贸易的英资洋行的竭力鼓动下，英国政府用坚船利炮强行侵占香港，揭开了近代香港逾150年历史的序幕。

近代香港的开埠

英国对香港的侵占其实早有预谋。1834年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W. J. Napier)来华时，就已看出香港的重要战略和商业价值，提出了占领香港的建议。怡和洋行创办人渣甸(W. Jardine)也表示：如果认为“我们必须占有一个岛屿或是占有一个邻近广州的海港”的话，那么香港最为适宜，因为“香港拥有非常安全广阔的停泊港，给水充足，并且易于防守”^[2]。事实上，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原停泊在伶仃洋面的大部分鸦片趸船均已转移到香港区域海面。占领香港，无疑为英国在中国的扩张以及英商对华鸦片贸易夺得了一个最有利的据点。

1841年1月25日，就在义律单方面宣布已与清政府签订“穿鼻条约”的数天后，义律率领的东方远征军就迫不及待地强行侵占香港岛，翌日由英国驻远东舰队支队司令伯麦(Commodore Bremer)率部举行隆重升旗仪式。登陆的地点就是香港岛上环水坑口街附近一个高约200英尺的海角，后称“占领角”(Possession Point)。同年6月7日，义律代表香港殖民当局宣布将香港开辟为自由港，允许船只自由出入，香港正式开埠。

香港作为自由港，确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香港地处广东珠江口东侧，濒临南海和西太平洋，是中国南方的重要门户。它位居亚洲太平洋的要冲，处在日本和东南亚诸国的航运要道上。最具战略和商业价值的是，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环抱的维多利亚海港，港阔水深，海港面积达60平方公里，最阔处近10公里，最窄处1.6公里，水深9米至16米，港内可同时停泊150艘远洋轮船，吃水12米的远洋巨轮可自由进出。港外有天然屏障，港内风平浪

静,是与旧金山、里约热内卢齐名的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它在开埠后的 100 多年间,从对华鸦片走私的基地发展为远东转口贸易的繁荣商埠。

1841 年英国侵占香港之初,香港主要是一个海岛型的渔农社会,据 1841 年 5 月 15 日香港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当时香港岛的人口仅 5 450 人,散居于赤柱、筲箕湾、香港村等约 20 个村落,主要是渔民、佃农、石匠、市集商贩和少量来自九龙半岛的劳工^[3]。渔民主要居住在香港村、群大路、大浪等渔村,以沿海捕鱼为生;佃农则向锦田邓族、南头黄族、上水廖族租种位于港岛北岸黄泥涌、扫杆埔及南部赤柱、深水湾、浅水湾的农地;石匠聚集在港岛的鲷鱼涌、阿公岩、石塘咀等地采石,供当地渔农修筑房屋、兴建神庙。其时,九龙半岛西岸的油麻地、何文田、大角咀及东岸的红磡、大口环等地亦散居着为数约 5 000 的渔农石匠,而后来被称作“新界”的地区则聚居着以锦田邓族、河上乡侯族、粉岭彭族、上水廖族及新田文族五大姓为主的居民,以农耕为业。这五大族皆宋、元、明间迁入香港^[4]。很明显,开埠之初,香港仍处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之中,渔民、佃农、石匠和市集商贩构成社会的主体。

不过,这种平静的社会结构很快就被打破。随着侵占香港英军的登陆,以怡和洋行为首的一批与鸦片走私密切相关的英资洋行相继从广州、澳门进入香港,他们抢先在港岛北岸从铜锣湾到中环地段建立据点。原先停泊在伶仃洋面的鸦片趸船也纷纷驶进维多利亚海港。1841 年 6 月 14 日,义律代表香港殖民当局首次拍卖沿海土地,他在港岛北岸划出 40 幅地段公开拍卖,每幅地段约有 100 英尺海岸,底价 10 英镑,结果共售出 33 幅土地,最低价为 20 英镑,最高价 265 英镑,平均每幅地段价值 71 英镑。中标者包括 25 家洋行或私商,大部分是英资洋行,其中,怡和洋行投得铜锣湾东角,林赛洋行投得湾仔春园,宝顺洋行则投得中环地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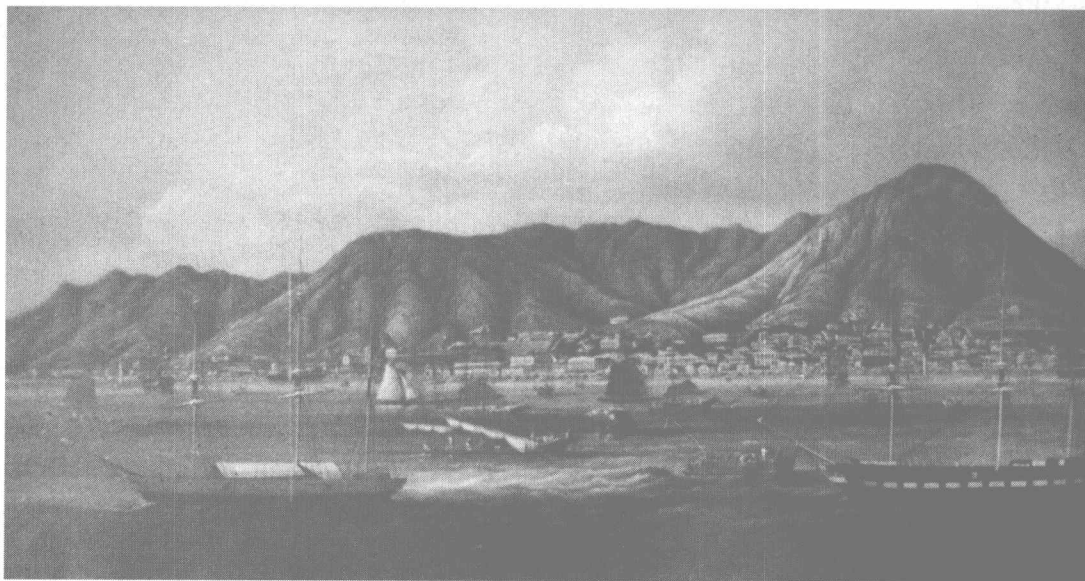
1841 年 8 月,砵甸乍抵港,接替义律主持香港的殖民开发,1843 年并出任首任香港总督。砵甸乍到香港后即着手制定香港的城市发展规划,他将港岛划分为 3 个区域,包括海域区、城市区和郊区:规定离海岸 200 英尺范围内的区域为海域区,现今中环沿海地区、跑马地、赤柱及香港仔等处为城市区,而其他地区则为郊区^[5]。后来,中环沿海地区发展成维多利亚城。当时,怡和洋行在铜锣湾东角经营,孟加拉志愿军则驻扎在西营盘,1842 年建筑的

皇后大道将东西两个据点连接起来。皇后大道至海面的沿海地区是洋行、货仓的聚集地,商店则集中在灯笼洲,即后来的铜锣湾东角和湾仔春园一带,后来向西发展,形成皇后大道的繁华商业区。

1843年底,即中英《南京条约》批文交换后不久,砵甸乍为维护西方殖民者利益,将中环维多利亚城中心划为洋人专属居住区和商业区,东西两侧为华人区,跑马地一带则供华洋上流社会打猎、郊游之用。自此,域多利皇后街与花园道之间包括威灵顿街、云咸街、雪厂街、毕打街在内的中环地区,逐渐发展为洋人居住区和洋行、银行的集中地,成为香港繁荣的核心商业区。

早期华人的经济活动

随着香港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商业社会的形成,华人的经济开始发展。最早涌入香港的是广东沿海的水上艇户,俗称蛋民。他们驾驶着小艇进入香港的港湾,向停泊在维多利亚海港的洋船提供服务,将洋船上的货物运返仓库,或将岸上的补给送交洋船。由于生意不俗,这批艇户在短短数月间人数便急增至2 000人^[6],成为当时华人经济中活跃的一群。这批艇户中不少早在鸦片战争期间或之前已与洋商有密切联系,部分甚至已充当洋行的买办,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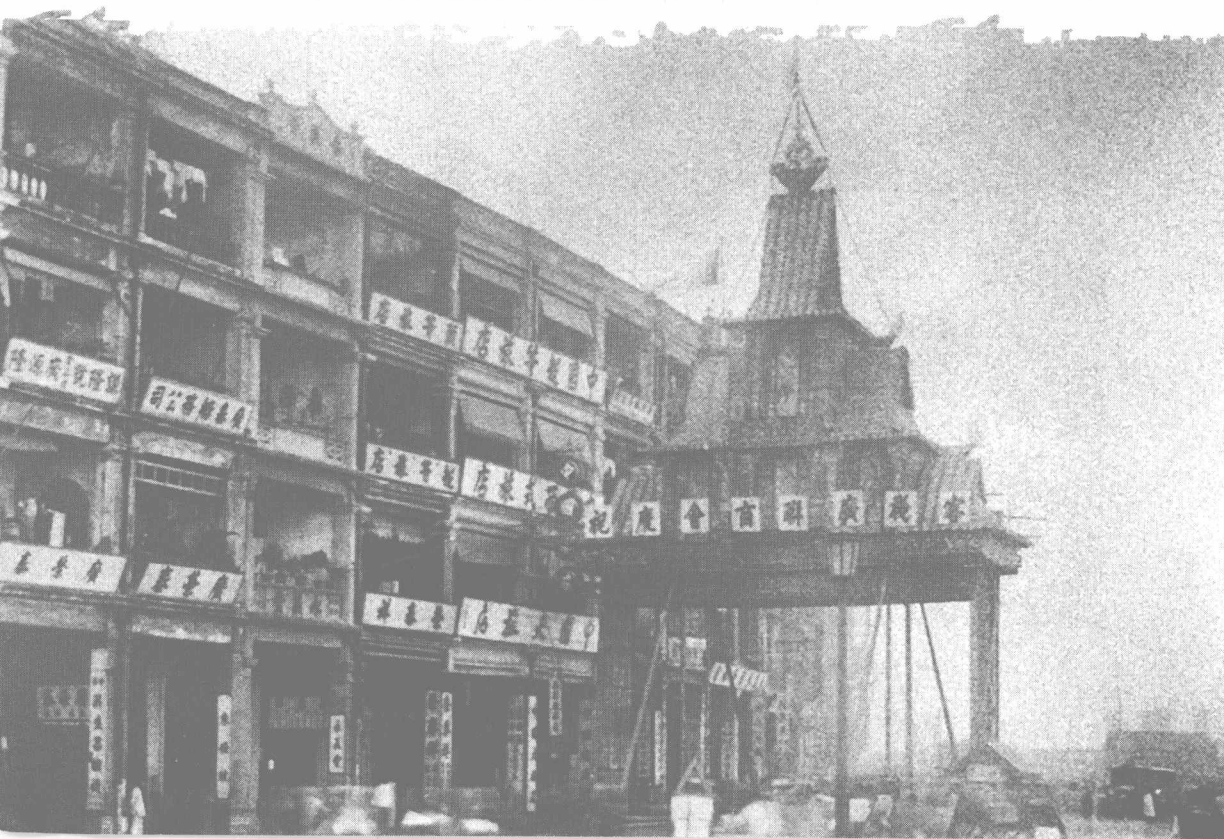


维多利亚城远眺。1850年代香港已略具远东贸易转口港雏形,各项建设亦告展开。



1880年代港島西
環威靈頓街，早期
的華商經濟已呈現
繁榮景象。

1910年代的干諾道中近三角碼頭一帶，海旁是碼頭
林立的貨物裝卸區，也是省港澳輪船停泊之處，故大
批金山莊、船務公司和旅店聚集於附近地區。



著名的,是充当兵船买办的卢景,他在鸦片战争时期已借供给食品给英船而累积起财富。战争结束后,他移居香港,到1850年已拥有楼房、店铺逾100家,成为当时香港华人首富^[7]。除艇户外,一些过去在澳门和广州同洋商有来往的中国人,也开始乘帆船来港,他们向香港的洋行购买鸦片、棉布、胡椒及其他商品,也运来一些中国货品。有些帆船甚至来自福建和浙江沿海^[8]。

与此同时,随着香港城市建设的展开,大批来自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贫民涌入香港,组成筑路建屋的庞大劳工队伍,其中的新富是这支劳工队伍的工头。昔日的石匠已摇身变为石厂老板,他们雇用来自外地的劳工扩大生产规模,利用所掌握的熟练技术,将矿场的大石切割为大小方块、长条,或雕琢成石柱,生产出坚牢耐久的建筑材料。著名的如邓元昌,原籍广东五华,来港后开设元昌石行,向香港政府承办了大量石工,在石塘咀、西营盘一带开采石场,成为巨富^[9]。因承包建筑工程而致富的还有谭才。谭才,原籍广东开平,早年移居新加坡,在政府船坞当管工,1841年来香港发展,成为当时最大的承建商之一。香港早期一些有名的建筑物,如铁行大厦、交易大厦等,都是由他承建的。谭才后来还成为香港最大的苦力贸易经纪及赁船商,通过贩卖华工积累了大量财富。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随着广东沿岸各地华人的大量流入,以西环太平山为始点,东至砵甸乍街、西至西营盘的华人新移民区逐渐形成,成为港岛人口最密集的社区。为适应区内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由华商经营的店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1845年华人开设的店铺有388家,行业种类共59个,包括米铺、食肆、酒铺、面包店、洋食办馆、食品杂货、漆器店、茶叶庄、丝织庄、呢绒庄、洋服店、故衣店、理发店、旅店、兑换店、当铺、鸦片烟馆等等,有关居民日常所需衣、食、住各类物品一应俱全^[10],形成了一个与中环核心商业区迥然不同的繁华华人社区。

行商及买办崛起的背景

尽管华人经济开始蓬勃发展,但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华商在香港经济中的力量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有两项事件对香港华商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以及美国、澳大

利亚先后发现金矿。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席卷广西、广东及大半个中国。当太平军迫近广州时,广州及附近城乡的大商贾、大地主纷纷挟资财逃难到香港,这是内地华人富户移居香港的第一次。在此之前,涌入香港的主要是艇户、商贩、工匠、苦力以及地痞流氓、私泉海盗。这批富户到港对香港华商的冒起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此,英人理雅各认为:“这是香港发展过程的转折点,广州的安全受到威胁,富有的家庭争相走难,很多逃到香港来,房子需求大增,房租激升,往常人迹疏落的街道一下子挤满人,新的华人商号启业,华人商业受到刺激……”^[11]这批华商纷纷在香港开设商号,令香港市面呈现开埠以来仅见的繁荣气象。

1848年和185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悉尼先后发现金矿,掀起空前的淘金热潮,大批中国劳工经香港赴美、澳当苦力,刺激了香港航运业的勃兴。随着美、澳及南洋各埠华人社区的形成,在香港经营南北洋转口贸易的“南北行”商和专门贩运货品到北美及南洋的“金山庄”、“南洋庄”等行商乘时崛起。这种由华人经营的行商因为切中海内外华人社会的需要,在香港很快发展起来,成为当时华商经济实力中最强的一股势力。这些行商约掌握了当时香港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12]。行商的迅速崛起,将当时香港社会因沿海五口通商而引致香港贸易地位衰落所普遍存在的悲观情绪^[13],一扫而光。

与此同时,华商中另一股重要的经济力量——受雇于外资洋行、银行、轮船公司的华人买办势力亦迅速抬头。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英资为主体的洋行数目急增,据统计,1846年香港有洋行22家^[14],1870年已急增到202家^[15]。这时期,著名的洋行有英资的怡和洋行、沙宣洋行、太平洋行、林赛洋行、丹拿洋行、仁记洋行、德忌利士洋行、太古洋行,以及美资的旗昌洋行、琼记洋行和德国资本的禅臣洋行等。这些洋行的业务,主要是经营大宗货品的远洋转口贸易,包括鸦片、棉纺织品、洋货、茶叶、丝绸和中国的土特产品。

随着转口贸易的发展,英商将投资的触角伸向当时香港经济的两个最重要的行业:航运、仓储码头、船坞业和金融业。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航运业从帆船时代进入轮船时代,香港各大洋行纷纷筹建轮船公司,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航线上展开激烈竞逐,其中著名的有旗昌轮船公司、太古轮船公司、怡